

SHISANJING LIANZHENG SIXIANG YANJIU

十三经

廉政思想研究

何山石/著

深度解读《周易》《尚书》《诗经》《论语》
《孟子》《孝经》中的廉政思想

十三经中的诸多与治国理政相关的资源，密集地出现在中国大国政治生活的话语中，这既是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的重要表征，又极其生动地表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是需要从十三经这样的典籍中寻找理据的。



人民出版社

十三经

廉政思想研究

SHISANJING
LIANZHENG SIXIANG YANJIU

何山石/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经廉政思想研究/何山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01-016885-2

I. ①十… II. ①何… III. ①《十三经》—研究 IV. ①Z12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5157 号

十三经廉政思想研究

SHISANJING LIANZHENG SIXIANG YANJIU

何山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

字数:290 千字

ISBN 978-7-01-016885-2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第一章 传统复兴与“十三经”的当代价值	1
第一节 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传统失落”背景	3
第二节 重回“读经”传统及其现实意义	16
第二章 《周易》：“易道”与廉道	25
第一节 乾、坤卦及《文言》中的廉政思想	26
第二节 《周易》诸卦廉政意蕴发微	37
第三章 《尚书》：最具廉政阐释品格的“档案”	83
第一节 《虞夏书》：一个源头性的廉洁构想	85
第二节 《商书》：以“戒”为主题的廉政思想的兴起	97
第三节 《周书》：对前代廉洁思想的总结与深化	106
第四章 《诗经》：廉政建设的文学表达	128
第一节 对“诗序”的廉政视角理解	128
第二节 “美刺”传统与廉政建设——对“国风”中的“廉 诗”分析	141
第三节 “雅”、“颂”诗中的“廉政”寓意述论	157
第五章 《论语》《孟子》：仁政诉求中的廉政观念	177
第一节 孔、孟之“仁”与廉政：以“仁”为核心的考察	180
第二节 《论语》《孟子》中的公共权力思想与廉洁治理	196
第三节 孝治与廉洁	213
第四节 《孟子》的“仁政”——“民政”——“廉政”论述路径分析	226
参考文献	236

第一章 传统复兴与“十三经”的当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治理所具有的伟大力量,正在被一次又一次确认,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正成为近期国家文化建设中的重大事件。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对儒家学说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功用,进行了具有国家高度的总结: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种界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作用是精到的揭示。同时,习近平同志又对这种概括性的作用揭示进行了细化分析: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

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中国复兴传统,已经在具体的措施上着力了。比如,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决定在中小学这一基础教育阶段,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5年6月,由国家行政学院编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领导干部国学教育系列教材”,计十一册,从修身之道、处世之道、用人之道、治兵之道、应急之道、廉政之道、执法之道、谋略之道、治国之道、天人之道十方面切入,“系统地阐述了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与当代行政管理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相互融合,为提升各级行政领导的执政思想、强化决策能力、创新执行策略、扩大用人视野、融入德性思维等方面,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策略指导,体现了‘为人修身、为政以德、为官有法、公正和谐’的新时期执政理念。”^①至此,从小学至成人的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规划基本完成,复兴传统最重要的举措——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与学习这一行为,真正启动。

2015年10月,教育部又公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从家庭教育这个角度,又对传统文化的重拾进行了规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对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家庭教育工作实践,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家庭美德发扬光大。”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延伸,是整个

^① 参见中国经济网2015年6月15日相关报道。

国民教育行为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整合中国传统优秀的家庭教育资源,如家训、家书,为当代家庭教育实践提供不竭的支持,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以上诸种行为均表明,中国在长期违离传统之后,对抛弃传统所带来的切肤之痛有了极为清醒的体悟之时,再次对传统表达了至高的敬意。

第一节 传统文化当代复兴的“传统失落”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得以倡复,是以传统文化的百年失落为巨大代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失落情景,有“儒学宗师”之称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有独特的描述。下面借助梁漱溟先生的描述,以明中国传统文化失落的大致轨迹。

梁漱溟先生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阐释这一变化的。他指出:“中国自从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谈天》,西方化才输到中国来。这类学问本来完全是理智方面的东西,而中国人对于理智方面很少创造,所以对于这类学问的输入并不发生冲突。直到清康熙时,西方的天文、数学输入亦还是如此。后来到咸同年间,因西方化的输入,大家看见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的奇妙,因为此种是中国所不会的,我们不可不采取它的长处,将此种学来。此时对于西方化的态度亦仅此而已。所以,那时曾文正、李文忠等创办上海制造局,在制造局内译书,在北洋练海军,马尾办船政。这种态度差不多有几十年之久,直到光绪二十几年仍是如此。所以这时代名臣的奏议,通人的著作,书院的文课,考试的闱墨以及所谓时务书一类,都想将西洋这种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①此一长段文字,梁氏欲表明观点是:中国对西洋东西的引入,并未注意到这些东西背后的文化,而文化是根本,是道,是体,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等物,是器,是用,若仅仅引入器、用,何有益于中国之进步?因而,国人认识此点之后,开始废科举、兴学校、变法以至着意政治制度的改革,如引

①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入西洋的立宪制度、代议制等,同时,革命论者变革现行社会制度的行为,也因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将之推向极致。但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使人“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①陈独秀等人就认为,中西之根本不同,在于文化的不同,特别是文化中的伦理思想的不同,即梁漱溟所说的“道德都不对的”,到最后,“大家提倡此时最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②梁漱溟对这一段历史巨变的追溯,是要告诉世人,文化领域里的变革,是当时所有变革中的最重要者。可惜,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寻找让中国掉头而强大的精神力量时,做了一个绝对的选择: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转而膺服西方文化。就是如梁漱溟这样的最终的儒者,在此时亦认为:“但是我要反问一句:现在对于东西文化的问题既然问到最后的根本,不是已然看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宗教、哲学、道德、艺术根本上不对么?不是要做思想的改革、哲学的更新么?怎样又可以说精神方面中国人有长处呢?”^③这应该是当时的中国思想阶层中,有代表性的对西方文化的体认,梁漱溟如当时诸多知识分子一样,由器至道,完全表达了对西方文化的膺服,成为一个他自己所谓的“西方功利派”。也正是有了众多如梁漱溟、陈独秀等这样的“西方功利派”的推动,新文化运动才得以推行。

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推行,中国人对传统的抛弃便开始了。当历史的尘埃远去,我们开始理性地审视这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运动时,我们既能清晰地看到新文化运动的进步,那就是:“陈独秀的思想革命优先的看法有着历史的先见之明。不先行思想革命,由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独立、法制、责任等意识的人来从事单纯的经济建设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社会问题,导致产生权与钱相结合的变相官僚资本,形成财富分配极不公平现象,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当下社会漫延的极端功利化趋势也与单轨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④新文化运动以自由、人权、平等、

①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②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③ 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④ 胡军:《中国儒学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法治、民主、科学为宗旨,倡导以此宗旨而确立新的人生观,并且将这种新人生观确立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以创生一个“青年中国”,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在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研究者更看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不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等人的偏激:“我们也应该看到陈独秀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新人生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但是他却不能够正确的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将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要引进和确立新人生论就必须全盘地颠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要彻底地推倒儒家思想传统……”^①

其实,中国离开自己的传统,新文化运动只起了引领作用,虽然这种引领必不可少,可是,我们更应看到,我们离开传统,是全方位的。

闻一多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时代:“我们这时代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作为标准的时代,这样我们便叫作适应时代精神。”钱穆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说:“这最近一百年,我中华民族正步进了一步大恶运。”正如闻一多所言,当时的“时代精神”,便是“事事翻脸不认古人”,以为以简单的否定传统方式,便可解决中国当时的积弊,今天再回过头来理性审视,完全可以看出这实在是不甚高明的手法,更为有害者,便是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入“大恶运”阶段。

同时,全面否定传统,又以激进的全面接受西学为手段。在20世纪西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治国思想的选择,过多地倾向于西学,这是不争的事实。众所皆知,域外思想的传入,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历经多次。最为人熟知者,便是佛教的传入。佛教传入,完全没有改变儒家传统在中国的主流位置,正如汤一介所言:“中国固有文化仍然是‘源’,而印度佛教文化只是‘流’。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很长,在魏晋时有着广泛的影响,然就其与‘魏晋玄学’的关系说,并非因佛教的传入而有‘玄学’,而恰恰相反,是因有‘玄学’而佛教才得以在我国比较顺利地流行。”^②从汤一介的说法完

① 胡军:《中国儒学史·现代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② 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全可以看出,佛教的传入完全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什么是源,什么是流,清清楚楚。佛教传入中国,完全没有取代中国原有文化的主导地位,相反,佛教要接受中国已有文化的改造,比如,佛教要接受儒家文化的改造,如儒家孝道观渗入佛教、僧人注释儒家经籍等,这完全不是丢弃中国的传统,而改用佛教作为中国社会当时的统治思想,所以,这种文化输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在国人的心中,异域思想的输入仅仅是灌溉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更加枝繁叶茂。

又如始自明末的域外思想的传入,也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与佛教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样,只是修补、更新着已有的中国文化,而不是让中国的发展完全脱离传统文化的规制。即使时至晚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中兴名臣”,他们一方面推行洋务,接受西学,但从未动摇过儒学等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所以,在《曾国藩家书》这样的私信中,大量记录着曾国藩如何教育自己的兄弟及其他晚辈读经读史的方法,教育他们如何在传统文化的教育中完成立功、立德的自我进化。如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给四位弟弟的书信即言:“六弟、九弟在城南读书,得罗罗山为之师,甚妙。然城南课似亦宜应,不应,恐山长不以为然也。所作诗文及功课,望日内付来。四弟、季弟从觉庵师读自佳。四弟年已渐长,须每日看史书十页,无论能得科名与否,总可以稍长见识。季弟每日亦须看史,然温经更要紧,今年不必急急赴试也。”^①左宗棠这样的亢直之士,醉心实学的同时,完全没有离开“儒术”,类似于《燕台杂感》中“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贫尤赖,民有饥心抚亦难。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这样的吟唱,多次出现,表达他以儒术安天下的治理理想。张之洞更是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持守“中学”的主体地位,以“西学”济“中学”之乏,以今人之眼光来看,这一提法,实是睿智。

所以,五四以前,中国固守传统,以西学来补中国传统的不足,这应该是

^① 曾国藩著,李翰章编撰,李鸿章校勘:《曾文正公家书》,线装书局2015年版,第63—64页。

一个让传统文化自新的有效方法。但 20 世纪自五四运动开始,将中国落后的原因,都归之于传统文化的阻碍,都要以彻底的反传统来促成中国社会的变革,像吴虞这样的反传统“悍将”,将孔孟礼教直接视为“吃人”之学,已经完全脱离了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在 20 世纪,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中国一步一步地完成了对传统的背离,曾经支撑中国国家治理的儒家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

近年来,对五四运动进行专门研究的研究者,于五四运动某些有意思的侧面,进行了发掘,例如欧阳哲生的《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便是如此。欧阳哲生看到了五四中反传统的一代知识分子,其成长深深受惠于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是反传统,这并不错。但新文化运动并不是空穴来风,除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一外部条件以外,还有中国人文传统内部演变所提供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教育背景或国学素养。蔡元培曾是翰林院的编修,陈独秀中过秀才,他们有传统的功名;鲁迅、钱玄同曾问学于经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下;胡适早年也有自修《十三经注疏》的经历,对清代朴学尤为欣赏。”^①只是像陈独秀这样的激进的反传统悍将,只看到了传统的消极成分,并且无限放大这些消极成分,如儒家伦理的君主专制、礼教对人性的伤害以及儒家伦理所张扬的价值观。在这种思维的驱动下,陈独秀、吴虞等人到最后演变为只看到儒家传统的弱点,而完全忽视了儒家传统固有的优势。

而我们现时复兴传统,审照传统的视角刚好反转了,我们尽量忽弃传统的弱点,张扬传统的优势,这才是继承传统应有的态度。欧阳哲生等人认为五四不是传统的“断裂”,如新文化运动悍将们的“整理国故”行为,便是在继续延伸传统,这一见解是新锐的。但是,也一定要看到,五四知识分子延续传统与开启的抛弃传统行为是同时进行的,五四知识分子身上流淌着传统的血液,无法割舍,传统的影响无法消除,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一切,而他们开启的全民性抛弃传统运动,却无法阻止地开始了。以此为起

^① 杜羽:《五四不是传统文化的断裂——访〈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作者欧阳哲生》,《光明日报》2013 年 5 月 5 日。

点,中国一直沿着五四的模式,以民主、科学等相呼召,最终将传统在支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摘除了。

虽然,在20世纪,对传统的坚守,不乏其人,像闻一多这样的清醒者眷恋着传统值得敬佩。这里最值得提及的,就是所谓新儒家诸人为坚守传统而持续地呐喊。新儒家是20世纪,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直接与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相对抗的思潮,这股思潮坚信儒家传统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新的世代里同样可以推动中国前进,包括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新儒家在20世纪初以所谓“三圣”为开端,即新儒家三位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三人。梁漱溟先生的某些思想在上面已经有所述及,梁漱溟将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划分为西方功利派、佛教出世主义、儒学三期,“梁漱溟的转变轨迹,其实也开启了百年传统的另一种隐性的发展”,这种隐性发展,在21世纪已经得到了印证,我们的发展又回转到了传统。一般认为,当代新儒家分为三代:第一代以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勱、冯友兰、钱穆为代表,他们的活动时段大致为1921年至1949年;第二代以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活动时段大致为1950年至1979年;第三代以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为代表,从1980年发展至今。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如杜维明,致力于儒学与现代社会的结合,其代表作如《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道·学·政:儒家公共知识分子的三个面向》《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等,都以此为思考原点,这也正是儒家一直张扬的经世致用主张的生动体现。因为对新儒家的详细介绍与梳理,并不是本书写作的主要内容,而且,在后续的章节中,如在《论语》《孟子》的廉政思想研究中,也会涉及,所以,此处的介绍也就从略了。

这里提及新儒家,是要反驳一种观点,即认为在20世纪,我们并未抛弃传统,新儒家诸人,以及反传统的陈独秀、鲁迅诸人,不都是在传统中成长并且一直身负传统而前行?甚至是毛泽东这样的国家最高领导者,一生读二十四史并且详加评点,其读《资治通鉴》多达17次!我们何时抛弃过传统?对这种质问,只能说,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切断与传统的联系而成为“新民”,20世纪里的一代又一代人,同样如此,而且正是因为有这种对传统的不自觉的继承,我们现在谈传统复兴才有根基,不然,我们根本无传统可“复”。

这里所说的抛弃传统,强调的是中国的治国思想,不再以儒家传统为根本指针和指导思想,在国家治理中,儒家思想旁落,这才是20世纪对传统最大的放逐。

正是因为这种放逐,在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传统的时候,调和马克思与儒家思想的声音就开始出现,如汤一介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直影响着中国社会,除了中国社会确实需要一巨大的变革外,我认为这和儒家思想重视‘实践’(道德修养的实践,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①特别是近年来,如方克立这样的研究者,致力于调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说法,其专著《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讲述的核心问题,就是作者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对中国文化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的命题的思考。无法对这种调和的声音作一种价值评判,但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理解,这种调和的努力,寄寓着对传统回归的热望。

因为在国家主流意识中,儒家传统不再占据核心位置,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中国在各个领域里都慢慢离开了传统的浸润。本书以为,20世纪国民教育领域对传统的疏离,特别是中国人不再以传统经典作为国民启蒙的力量,新式教育体系挤压传统经典的生存空间,是所有让传统文化变得体无完肤的行为中的最痛之举。

在20世纪初,即清末,传统文化的教育在基础教育中仍在延续,中国人在小学阶段接受的是传统的熏陶,这从1902年的《钦定蒙学堂章程》《钦定小学堂章程》,1904年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等“教学大纲”完全可以看出。这时候的“教学大纲”的设定,完全以“十三经”的教育为核心,分步在小学阶段推进传统文化的教育。1904年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各科目教育要义”为“读经解经”与“中国文字”,“读经解经”“其要义在授读经文,字数宜少,使儿童易记。讲解经文宜从浅显,使儿童易解,令圣贤正理深入其心,以端儿童知识初开之本。每日所授之经,必使成诵乃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博综精研”经义打下基

^① 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础,“此乃中小学堂讲经通例”。该章程明确规定:

现在定以《孝经》《四书》《礼记》节本为初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五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

第一年,每日约读四十字,共读九千六百字;

第二年,每日约读六十字,共读一万四千四百字;

第三四年,每日读约一百字,共读四万八千字;

第五年,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共读二万八千八百字。^①

而1904年的《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的教学内容包括“读经讲经”与“中国文学”两大内容。其中“读经讲经”:

现在定以《诗经》《书经》《易经》及《仪礼》之一篇为高等小学必读之经。总共四年,每年除假期外以二百四十日计算,每日约读一百二十字,每年应读二万八千八百字,四年应共读十一万五千二百字。^②

从上引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的国民教育序列中,“十三经”处于核心地位。在一个人最重要的启蒙阶段,即强化传统经典的教育,奠定人生的底色。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虽然这种教育模式涉及的科目较为单一,但是,中国最传统的典籍以朝夕濡染的方式不停地熏陶着国人的精神成长史,这才是让传统不绝如缕地传承下去的最有利的方式!

从1912年中华民国颁行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开始,中国的国民教育,在小学教育序列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虽然1916年颁布的《国民学校令施细则》有“读经要旨,在遵照教育纲要,使儿童熏陶于圣贤之正理,兼以振发人民爱国之精神,宜按照学年程度讲授孟子大义,务期平正明显,切于实用,勿令儿童苦其繁难”,但在接下来的“修正案”中删掉了此条。从1923年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国语课程纲要》开始,至2000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共颁行了19个“教学大纲”,之中均无“读经讲经”之说,保留时间较长的传统文化教育项目,

① 何慧君、姚富根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② 何慧君、姚富根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只有“书法”(统称之为写字),如1954年的《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中,有“学习写字,初级小学一、二年级用铅笔,三、四年级兼用钢笔,高级小学还要兼用毛笔”的规定^①,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有“要重视毛笔字的教学,切实加强书写指导。从描红、仿影到临帖,逐步做到写得匀称,纸面干净”的规定^②,在2000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中,中、高年级都有相应的毛笔书法教学规定,但是,在21世纪初的十多年内,有些小学基本取消了书法教学。

在中学阶段,从清末1902年颁行的《钦定中学堂章程》开始,至2000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共有34种语文“教学大纲”。从这些大纲的规定来看,传统文化的教学也日呈弱化之势。1902年颁行的《钦定中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书经》《周礼》《仪礼》《周易》与词章的教学,1904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讲读《春秋左传》《周礼》两经”,而且书法要“兼习小篆”^③,而在民国时期,中学阶段的教育,还有令人惊喜的传统文化含量,如由胡适起草的1923年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便有“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继续练习用文言文作文”这样的教学目的的设定,而且,对“诸子文粹”“四书”“古史家文粹”“史通”“清代经学大师文选”,以及王充、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朱熹、王守仁、崔述、姚鼐、曾国藩等,最少精读六种,略读五种。^④但是,正如小学阶段的教育,在20世纪,初中、高中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成分,由于受整体的教育设计思想影响,如自然科学成分增加、教学科目增多等,变得越来越少,甚至在最近的几年内,有取消小学教学中的古诗词这样的传统文化内容的举动,因而,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在2014年第三十个教师节,习近平在

① 参见何慧君、姚富根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② 参见何慧君、姚富根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③ 参见何慧君、姚富根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269页。

④ 参见何慧君、姚富根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

北京师范大学参观时的“去中国化”的说法：“我很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从小就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我们的“去中国化”行为，断送的就是“民族文化基因”！

有人也看到了中国教育的这种“微妙”的变化：“在对待中国文化和儒学的问题上，这个‘亦步亦趋’，实际上也是一个愈来愈左的趋势。一入民国，隐微的心理即涌入意识层，流变为对儒学的正面打击。民国元年，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连续三大动作：元月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五月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七月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的议案。从教育制度上给儒学在 20 世纪的生存一个废除地基性质的打击，为呼唤新文化运动和 20 世纪反儒反传统，作出了启示和铺垫。”^①这样一来，“所谓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精神，终于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现代中国的几乎全部知识心灵”，所以，甚至可以说，在 20 世纪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去中国化”的行为，一直没有停止过。当前，中国在 20 世纪里成长起来的几代国民，连最基础的经学教育与训练都没有了，那些曾经支撑华夏文明走过几千年发展历程的最基础的典籍，那些被一代又一代人诠释过的经籍文献，仿佛一夜之间就从中国人的视野里淡出。站在 21 世纪去审视 20 世纪的这种“去中国化”，一种极为强烈的感受就是，似乎华夏文明发展的史册，20 世纪这一页被撕掉，这种文明断裂感，估计对中国文化发展有思考的国人，都能感受得到。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20 世纪中国教育发展中越来越浓厚的功利化趋向，以及这种功利化趋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国民精神成长的伤害。教育，不可能完全脱离功利化，孔子兴办私学，亦收受干脯，《论语·述而》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依据孔子语意，即使只给十条干肉这样的“薄礼”来求学，也没有不教诲的，言下之意，受教于孔门，可能还有更高的物质条件方面的要求。施教者从教育中获得利益，这是教育功利性的一面，受教者获得技能，并以这样的技能谋取物质利益，这是教育功利化

^① 罗义俊：《20 世纪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宣言〉》，见《生命存在与文化意识：当代新儒家史论》，学林出版社 2009 年版。

的另一面。究其本源,教育有一定的功利化目标,是教育必有的属性,无可厚非。正因为如此,朱熹在制订白鹿书院的“教学大纲”时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熹正指出了,教育除了功利,还有“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的非功利目标。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呼唤教育的非功利性,即教育对人内心的完善、德性的提升。在20世纪的教育整体格局中,功利与非功利的博弈,功利性完全占据了上风,中小学教育科目的设置,强化自然科学一极,弱化人文教育,以至考试成为教育的核心目标,等等,都使教育过多地倾向于功利化这一极。正是因为教育的功利化选择,使传统文化这些“无用”的科目,在年轻一代的成长空间里被一再压缩,年轻一代,离传统便越来越远了。

教育,塑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性,教育设计思想,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路径。在20世纪的教育及教育设计理念中,将传统文化的教育逐离国民教育的核心位置,其带来的传统断裂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在21世纪的中国,越来越感觉到剥离传统之后,国人精神世界的单薄与贫瘠,物质生活的丰富并未让中国人得到相应的道德提升,相反,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正赤裸裸地横陈于国人面前,如官员道德失范、社会正义底线被突破、天人合一观抛弃后的环境破坏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向传统转身,开始从传统文化里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良药,“复兴传统”被大力提倡。而这种复兴,首先就是在教育领域里进行纠偏,让传统教育回归我们的教育传统。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重新表达了对传统的敬意:“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份《纲要》旨在重构从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按照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感受力、理解力、理性认识、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这样的渐进顺序,逐步让青少年学生接受传统教育。《纲要》明确规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这无疑能让